

日本华侨华人认同与语言使用状况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and Language Use in Japan

中岛一树*

(Nakajima KAZUKI)

摘要

日本华侨华人长大背景与状况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为了认识现在日本华侨华人认同与语言使用状况的多样性，针对日本华侨华人青年个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调查，探究他们的认同与语言使用状况，同时尝试进行归类。结果发现，本研究受访者具有复杂的背景，认同类型、语言使用状况都是多种多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每位受访者对于认同的表现及其认同强度和类型都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二、日本华侨华人青年对自己身份负面认同随著成长减少；三、认同与归化不冲突。以期对今后日本华侨华人认同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日本华侨、日本人、认同、语言使用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and situation of 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growing up have changed a lot compared with the past.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of the identity and language use status of the 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cases of 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youths to explore their identity and language use status,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attempt was made to categorize the status of their identity and language use.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in this study had complex background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identity types and language use,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1) each respondent's performance of identity and the strength and type of identity varied to a great extent; 2) the negative identity of Japanes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with their own identities decreased as they grew up; and 3) there was no conflict between identity and naturalization. We hope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ssue of recogn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Japanese Chinese, Identity, Language use

* 中岛一树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系博士生。电邮地址: kazuki.1101j@gmail.com

前言

认同研究是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学者做过日本华侨认同研究（过放，1999；朱慧玲，1999；郭玉聪，2001、2005；石川朝子，2006、2008等）。其中过放（1999）提出的日本华侨认同之五种类型对后续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学者利用过放的分类进行分析与考察。目前日本华侨华人认同议题的切入口主要是华侨学校或中华街等华侨华人人口多的地区为主，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且它本身被建构的历程和背景都是因人而异。与过去不同，随著时代的变化，现在在日本的华侨华人其实并不一定就读华侨学校，也不一定居住在中华街。为了认识更多日本华侨华人认同的样貌，应该需要从不同视角去关注他们的认同议题。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认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日本华侨华人认同及语言使用样态的多样性，即是非华侨学校以及非中华街居住人士的认同与语言使用状况，为日后的日本华侨华人认同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访谈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以及无结构式访谈。本研究根据研究议题的需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所谓的半结构式访谈是社会科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常被使用的访谈方式之一。

半结构式访谈意味著研究者对访谈结构具有一定控制作用，但同时也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通常研究者事先会准备一份大纲，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对受访者提问。但访谈大纲只是一种提示，研究者在提问时也鼓励受访者提出自己的问题，并根据访谈情况对访谈程序和内容进行调整（林淑馨 2010：225）。因为本研究所探究的是日本华侨华人的认同与语言使用议题，这议题一定需要受访者较积极的参与，并且他们自由地描述自己的经历才能得到分析跟讨论的依据。因此既有受访者自由发挥空间，又有研究者的部分控制的半结构式访谈比较合适，就采取此方法来进行访谈。

（二）研究步骤

进行访谈之前，与五位受访者说明本研究的主旨。访谈时间为一人大约一小时，使用语言为日语。由于他们目前都居住在日本，所以使用LINE的通话功能进行访谈，得到五位的允许之下全程录音。访谈资料的处理上，访谈结束之后，笔者首先把录音转写成逐字稿，转写完毕后再把逐字稿翻译成中文，之后把逐字稿再给五位查看，与他们确认内容没有问题后开始做分析。

访谈于2022年1月至2月进行，为了确保访谈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进行两次访谈。第一次为完整的访谈，根据事先准备的访谈大纲访问，第二次访谈是辅助性的访谈，若第一次访谈有什么漏洞，受访者可以做补充。

本研究的受访者共有五位，从他们的出身地域分布来看，三位为从小就来日移民的青年，分别来自中国大陆的天津、福建以及台湾的宜兰。还有两位出生在日本的青年，分别来自鹿儿岛与神奈川。这五位受访者的父母均为中国大陆人或台湾人。为了方便，本研究把五位受访者的名称为个案T、个案F等方式来表达，这些T、F等字母所代表的是他们出生地的拼音头一个字。即是出生在天津的个案T、福建的个案F、宜兰的个案Y、鹿儿岛的个案L、神奈川的个案S。受访者背景资料归纳于表1。

表1：受访者背景资料

	个案T	个案F	个案Y	个案L	个案S
性别	男	男	男	女	女
出生地	天津	福建	宜兰	鹿儿岛 ¹	神奈川 ²
现在年龄	27	27	23	21	24
来日年龄	6岁	12岁	5岁	-	-
来日理由	父母工作	父母工作	父母工作	-	-
国籍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日本 ³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中文考试 ⁴	HSK5级	HSK6级	无	HSK4级	HSK6级
父母	中国大陆人	中国大陆人	台湾人	中国大陆人	中国大陆人

二、认同状况：我是哪里人？

在此方面，五位受访者都谈到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下面分别看一下具体的内容的同时，笔者尝试用过放教授1999年调查日本华侨的基础之下提出的五种认同进行分类：一、中国人认同；二、双重认同；三、日本人认同；四、边际人认同（介于两者之间）；五、跨国界认同（过放，1999）。

怎么说，哪里人。嗯，我一直觉得我是没有偏向于日本也没有偏向于中国，就是那种中间的人的感觉，可是最近有点不一样，觉得自己是有点像日本人的部分也变多了，感觉上。因为真的一直都在日本，而且也很少离开日本，我也不是做跟中国有关的工作所以。以前的话，那种一半一半的中间的意识，不过现在有点日本人意识产生。（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是〇〇人？）像是新闻报导，两国之间会发生问题吧，看到那些也觉得无所谓，就是觉得日本跟中国都有好处跟坏处，两边的优点和缺点我都看

¹ 鹿儿岛（Kagoshima）是位于日本九州岛的最南端的地区。

² 神奈川（Kanagawa）是位于日本关东地方的西南端的地区。

³ 从台湾籍归化成日本籍。

⁴ 中文水平考试HSK是由专业化国际中文教育考试服务机构—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汉考国际”）主办的国际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引自中文考试服务网）。

得到所以无所谓，也没有要站在哪一边的想法。（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呢？）我就跟大家说明，我是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不过这只是说明，好像没有特别意识到认同什么的。

（个案T）

从个案T的描述可见，他一直反复强调过去觉得自己是中间的存在，但同时还谈到因为已经太久时间待在日本，就最近开始产生了日本人意识。对于何时意识到自己是中间的人，他提出新闻报导中看到两国之间产生矛盾时，他就觉得无所谓，也不会站在哪一边，但还是表示最近产生了日本人意识，因此个案T的认同属于过放（1999）的第三类：日本人认同。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个案T在大学期间到美国学习英文时候的经验，他在美国跟周围的人说，自己是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但还表示这只是说明而已，可知这与认同关系没有那么大。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华侨-商才民族の素颜と実力-》一书中也看到日本华侨对于自身认同的困境和复杂性。在该书中有位定居神户的华侨人士表示：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何国人，就算归化了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可是保留中国国籍也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会觉得有点寂寞（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

中国人，是中国人，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犹豫的感觉。（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会，还有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在日本自杀的人有点多吧，跳楼，跳到电车自杀等，所以我去车站偶尔会看到那些由于跳到电车自杀停运的通知，这样的時候偶尔会觉得，我的话应该不会选择这么做，如果这是中国人的话不一定绝对，但还是不会选择自杀的吧。所以怎么说呢，心理层面或者精神层面，思维方式之类的可能不一样，觉得再怎么自己过得不好也自杀还是有点。。。虽然不会很明确地表达，就想，那如果我是日本人，处于同样的状况，我也会这么选择吗？之类的，想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嗯，就也会感到自己还是中国人。如果觉得自己是日本人的话，应该不会想这些事情的吧，所以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意识到我是中国人。

（个案F）

从个案F的描述中就看到比较明显的中国人意识，并且他说对于这个认同没有犹豫的部分。因此个案F的认同类型应该可以归列为过放（1999）的第一类：中国人认同。值得关注的是个案F从一种社会上价值观的部分谈到自己（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不同，他所提到的是对于“自杀”的看法，因为对于它的看法的不同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就是说在个案F的价值观中，没办法理解不少日本人选择自杀的行为，虽然对于这一行为的不认同不完全是文化或心理特征，但这里价值观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出他的文化认同中无法认同日本的原因。文化认同指的是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江宜

桦, 1998)。判断族群的重要标准, 除血缘之外, 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特征, 这种共同心理特征集中表现在价值观上(庄国土, 2001)。

所以在此参考两位学者的看法来解释个案F的话, 应该可以说不管从心理特征还是价值观上, 他持有的是中国人拥有的共同的归属感, 而不是日本的。还有学者提出, 人通过社会交流带来的理解和取向获得身分, 这种交往进一步保持和维持他们的身分(林南, 2011)。虽然个案F在日中两种文化中长大并且其过程中有大量的社交, 但从访谈中对日本人自杀表示的描述中可看到的价值观, 仍然是中国人的观点。

没法说自己是哪里人, 不过我可以给一些另一种解释方式来说, 就是觉得自己当不了日本人, 就像当不了真正的日本人, 这种感觉。可能在我的心中也有一些比例, 就是日本和台湾的比例之类的东西, 然后日本人的一些感觉上的东西我有时候还是跟不太上, 像是读空气(要读懂气氛), 日式的关怀方式之类的事情我还是无法真正理解。所以觉得我就有当不了日本人的感觉, 可是如果说自己是台湾人的话这也不对, 就心中觉得日本人六成, 台湾人四成, 或者一半一半,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真的很难很复杂的, 一半一半的样子, 一半日本人一半台湾人, 我觉得这样。然后对于这种感觉本身就不会有犹豫的感觉, 反而觉得这种自己里日本和台湾混在一起的就是我。人在日本可是不是只有过日本的节日或习俗, 还会过春节, 但也不会过其他中华的节日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好。这几年我读大学的时候, 日本元旦的时候我一直打工, 就跨年的瞬间或日本正月都不是很在乎, 可是春节还是尽量不打工, 就在家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是○○人?) 风俗习惯方面, 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半一半的人, 像是お盆(御盆节)这些概念也不是很了解。还有我会讲中文, 就讲中文的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是一半一半。因为讲中文也是无意识中就做的事情, 这方面会意识到自己当中的台湾血统, 大概这样。

(个案Y)

个案Y的认同或自我意识方面, 由于他长大的背景相当复杂, 在此做补充说明。虽然他血统上完全是台湾人, 不过由于出生后领养他的夫妻是日台夫妻(丈夫为日本人, 妻子为台湾人)的, 并且五岁开始移民到日本又归化到日本籍, 所以他在这里的描述也可看到相当复杂的内容。就像个案Y提到了自己当不了真正的日本人, 也说出自己里面有某种日本和台湾的比例, 他表示自己当中有六成日本人, 四成台湾人或是一半一半的认同。因此他的认同应该属于过放(1999)的第二类: 双重认同。这第二类双重认同中, 过放还有分日中型与中日型, 就是说哪一边较领先或比例较大, 所以进一步做归类的话, 他的认同可以归列为日台型的双重认同。

其原因提到为, 习俗跟习惯方面, 个案Y回应, 有些时候无法理解或跟不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态度、评价、归属倾向、自我认同和情感依附, 观测人们的群体文化自我概念、文化身分感, 以及行为举止与目标群体规范的趋同程度(王沛、胡发稳, 2011)。从这个解释来看, 个案Y的认同程度也似乎可以说得通,

比如在日本人要读懂气氛，或日本式的关怀别人的方式，甚至对于日本节日无法表示理解或认同，都可以看得到个案Y的归属倾向。

我是觉得呢，虽然出身在日本然后一直在日本，可是爸妈都是中国人所以就怎么说呢，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思维方式什么的或许比较接近日本，可是这部分其实两边都有，就是说两边的好坏都知道。可是我周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也会觉得自己还是中国人，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哪国人的话，就回答“中国人”，国籍也是中国，就基本上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有特别犹豫什么的就很普遍地想自己是中国人。有段时间爸妈跟我讲过，要不要把国籍换成日本？之类的，可是就算我改了国籍，从小认识的朋友们都觉得我是中国人，我也作为中国人来跟大家相处，所以自己的中国人的那种意识可能不会消失。（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是〇〇人？）就像跟家人一起出门时，爸妈都讲中文，其实小时候我觉得不太喜欢这个部分，因为跟周围的大家不一样，当时对中国人也没有很好的印象，所以比如授业参观（学校开放日）的时候，也不想要被发现我们是中国人的，这样的部分的确是有过。然后因为我名字也是中国人的，跟家人说的也是中文，周围的朋友跟父母都讲日文这样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包括在家里吃的东西，我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吃饭时的礼仪方面什么的，不管在学校里还是在朋友家里吃饭的时候都觉得，因为大家很安静就觉得跟自己还是有些差异，所以说跟日本人相处的时候偶尔还是会这么想。还有的话，我自己遇到不认识的日文的时候，朋友提出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是因为我父母之间都讲中文，虽然看情况，但还是我有一些用不到的或不知道的日文词，最近这方面也感受到。不过到了高中或大学之后，我没有那种负面的感觉，反而觉得我这样的背景更好，因为像会讲中文之类的，我不止中国，喜欢不同文化所以接触到各种文化是蛮幸运的，到高中之后开始这样想的，在大学也是有些中国留学生，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觉得很开心也觉得自己很幸运。从小就有中国人意识，可是怎么说呢，到了高中之后真正认识到自己，就是作为中国人很幸运，很不错的之类的这样的感觉。

（个案L）

从上述个案L的描述可见，她有中国人意识，并且还谈到自己的中国人意识可能不会消失，所以认同类型的话就归类到过放（1999）的第一类：中国人认同。从个案L的描述可知，无论她的语言、出生地、教育、社交，她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实际上她在访谈中说过，母语是日文，掌握程度最好的也是日文，但还是因为自己的中国名字，还有跟家人说中文等事让她产生中国人意识。

保留和使用中文姓名这种语言文字符号，是对汉语言文化的认同，也是对华人身分的认同（王爱平，2006）。从个案L在此描述的内容也可知，的确是中文姓名以及中文的使用对认同有较大的影响。

再者，有学者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使用先天赋予的特征来描述和解释他们的华人性，他把其状况解释为“先天赋予的族群身分”（陈国贲，2012）。⁵所以个案L对自己的认同的理解比较像上述学者提到的状况，就是说因为她的父母是中国人，姓名也用中国名字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另外，个案L还透过跟周围人的差异产生自己的中国人认同，就是说她跟她家人说的语言以及平时吃的东西和周围人的不同，这些不同影响了她的中国人认同的建构。

体现民族心理文化状态的民族文化具有非常的稳定性，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超民族和超国界，现代化的交通方式使地域界限淡薄，语言成为保持族群文化特征的重要标志（庄国土，2005）。所以对个案L来说，说中文这行为也是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的一种机会，即是中文使用是认同的标志。

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本族群的身分在与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区别中不断被加强，通过这些差异建构自己的身分特征（张海钟、姜永志，2010）。所以饮食习惯的不同也是对她来说一样是意识自己身分的一个表征，我们从个案L的描述可看到，她的认同是如何被建构的，主要是与周围人的互动来界定自己，也从所意识到的差异来建构自己。

虽然她的认同看似简单又明确，但实际上还是具有值得关注的部分。例如，她访谈中提到小时候不想被大家发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自己跟周围的人不一样，而且当时自己对中国没有太好的印象。但后来到了高中和大学之后，对这个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跟过去不同，反而觉得自己这样的背景很幸运，开始有了这样的看法。因为会讲中文，而且从小接触到两种文化就觉得这样不错。所以说个案L的认同上还是存在变动性，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华侨当中出现新的现象，就是说过去的华侨对自己的身分或背景具有负面的认同，以及近年看到这种华侨的负面认同的减少（滨下武志，2013）。个案L的访谈结果可看出，她的情况也算是一种对自己背景或身分负面认同的减少，甚至可以说是负面认同的消失。负面认同转为正面认同的主要契机应该是在高中和大学以后的交际上，因为那时候开始发现周围有很多人其实对中国及中文很感兴趣，对于自己这样两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也有了积极的看法。其实在几个以往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状况。例如，有一段时间对自己的中国人身分感到不快，还想过自己的父亲为何不把国籍改成日本。可是后来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感到高兴。同样在她的访谈个案中还有人表示，自己年轻时非常渴望从中华街以及华侨性质的事情离开，当时听到父母的姓名都觉得厌烦，就是想要逃避到哪里的感觉，但后来回到华侨社会，在华侨学校当老师（张玉玲，2005）。小时候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是华侨，甚至其中一位受访者试着否认掉自己的华侨认同。同时还表示，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慢慢开始接受自己的华侨认同和背景（永井智香子，2015）。实际上这种认同的变化或变动，应该可视为常见的，这个部分本研究的个案也不例外。

⁵ 例如，一位受访者谈到：我们之所以是华人，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华人，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另一位也强调：如果你生下来就是个华人，那么你将永远都是华人（陈国贲，2012）。

我觉得中国跟日本哪一个都不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什么什么人之类的，就是现在也想为什么出生就会有国籍这个东西，而且还有点强制性的。（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自己是○○人？）嗯，像是上班的时候，我是做教练员的，所以对应客人的时候，有时候客人看到了我的姓，因为一个字的就被发现不是日本人。还有外国客人过来的时候，我上司，他还有点带著一些偏见的口气会说“老外来了”之类的，上司是日本人，可是我就觉得什么叫“老外”，他也是从其他人看的话，也是一个外国人吧，所以以国籍来判断什么的，这些行为我有点不喜欢。这种想法是可能混血背景的人也应该会有吧。

（个案S）

从个案S的描述可见，她是比较偏向于哪边都不是，甚至对于“国籍”这个东西本身的想法也具有怀疑的态度。所以认同类型是应该可归列为过放（1999）的第五类：跨国界认同。

五位个案中个案S是唯一表示出跨国界认同的，其实个案S与其他个案在国家间的移动次数也不太一样，她大学阶段也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藤田结子（2012）认为，移民子女会产生跨国界认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移动。在她的调查中具有跨国界认同的个案也表示，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多次国家间的移动，这种经历让他们产生跨国界认同。⁶虽然个案S为出生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但其实她十三岁时到中国生活，而且后来又回到日本，所以从移动次数和生活场域来看，她是不断地接触日中两国的文化和语言，这是与其他个案明显不同之处。

另外，个案S具有这种跨国界认同的原因除了她的华侨背景之外，还有应该是根据自己跟日本人的互动中形成的。例如在工作领域跟日本上司的交际中觉得，对于以国籍判断别人或对外国人的偏见带著一种反感。

总的来说，从五位对自身认同的描述可知，他们的认同状况因为各自长大背景有所不同，就认同的状况也多种多样，类型上的归纳在表2。

表2：受访者认同类型

个案	认同类型
T	日本人认同
F	中国人认同
Y	双重认同（日台型）
L	中国人认同
S	跨国界认同

⁶ 还提到，移民子女中，有些人会两国之间频繁地来往，并且还会受两国的教育，结果不少人会形成跨国界的认同。

三、归国与归化

未来是否打算归国与归化以及对此有什么看法应该能反映出个案的认同表现，就是因为他们回答时一定会说出这么想的原因，所以这些内容都会是探究认同样态的线索。在此，首先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归国”和“归化”。本研究的“归国”意味着完全离开日本，并回到中国大陆或台湾的状态。“归化”意味着从原本的中国大陆籍或台湾籍换成日本籍，就是要问本研究的个案有没有打算归化日本的想法。

（一）归国

可能会有，如果在日本赚不到钱的话，可能会回中国去，可是如果将来我有了钱的话，杜拜或新加坡，去哪里都行。我过得方便的地方的话哪里都可以。不过现在都没有这种离开日本的勇气，因为在其他地方或国家都没有朋友。

（个案T）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有中国人意识，将来我死亡之前还是想回国，有点那种回到根的感觉吧。最后想要死在故乡，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像60岁70岁，到了这样年龄的时候，想要回国，然后最后把自己的骨灰埋在故乡，所以回国之前还是待在日本，这就是因为我的交际范围也是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人，所以至少到60岁会留在日本。

（个案F）

嗯，是的，有时候会想回去的事。我最开始也觉得从日本公司派到台湾的方式去那里，可能这样说有点不好听，就是类似于“逃避的路”，就是给自己两条路可以走，可以在日本也可以在台湾的，就是给自己多种可能性的感觉。我的工作是在仪表方面，就是做一些分析机器的公司，然后最近一些环保等问题，像是有没有遵守氧气排出量之类的，我们的机器就是测量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公司在台湾也有分公司，就我上司也跟我说，想要把我派到台湾工作，所以有可能几年后真的在台湾工作。所以很想去。

（个案Y）

之前我自己想，有点想去中国工作之类的事情，可是中国没有那种新卒采用（应届生录用），而且中国是学历社会，虽然有段时间想过要不要去中国找工作，可是认真想想就觉得，不是现在也可以，先在日本上班一段时间，累积一点社会经验之后再去做也可以。而且虽然去旅游可能会比较好玩，因为还是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样，可是听父母讲，他们觉得工作跟旅游还是很不一样，很辛苦，不一定好玩的，我朋友或亲戚当中也有些人想要来日本生活，这个部分一定有一些原因，所以认真想想就觉得我去中国找

工作也好像不是。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话，我原本打算去台湾学中文，也有那种想要在台湾工作之类的想法，爸妈说台湾治安比较好，他们让我去中国大陆的话好像不太放心的样子，可是台湾的话，他们觉得可以让我去，所以最近觉得台湾也不错，可是目前的话还是打算留在日本找工作。

（个案L）

为了跟父母或亲戚见面的话，短暂回去是应该会有可能。可是为了在那边生活回中国的话，应该不会这样，也没有一直留在日本的想法，未来我想去其他的国家。就是中国是已经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国家，虽然因为有家人所以喜欢，去旅游的话就可以。可是如果一直住在那里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愿意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在日本上班，看到这里的经济状况的过程中，这里的经济也有点接近末期之类的，就是将来不会有很大发展的可能性，除非是当公司老板等，所以比起可能性不大的国家，我更愿意到其他海外国家去生活。

（个案S）

对于归国方面，从几位个案的描述看出，各位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但其中三位个案T、Y、L都看似虽然有一些归国的想法，但这比较属于单纯的工作发展方面的考量。个案S对于归国方面表示，为了去见家人或亲戚短期回去是有可能的，但还表示长期居留在中国是不太可能。还表示对日本也是如此，也没有打算一直留在日本。想要去其他国家。其实个案T的描述中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不管对归国还是留在日本都没有一种固定或固执的想法。就是他认为自己生活过得好，方便的地方就哪里都可以。所以对于归国方面个案T、Y、L、S均没有强烈的意识。

华侨华人的认同既是有多层次，也有机会主义的特征（陈天玺，2003）。从四位的描述的确看出一些他们对寻求机会的重视，像是个案T表示，如果在日本赚不到钱就可能回去，还有个案S也表示，日本目前的状况来看可发展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想去其他海外国家生活。

世人，包括华人自己，总对华人保持不少刻板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对“根源”的强调。华人好像都应该“寻根问祖”、“落叶归根”、“饮水思源”（陈国贵，2012）。对于陈教授所表示的看法，其实笔者本身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侨华人的一些刻板印象，尤其是对于祖国或家乡方面的看法，笔者进行访谈之前或多或少以为受访者对归国方面表示强烈的反应，但实际状况不是如此，在归国方面的描述可知有些人还有跨国界的意识。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全新的视野来认识华侨华人。

然而，个案F的描述中所看到的内容跟其他四位受访者有巨大不同。从个案F的描述中可见，在这些部分他的中国人意识还是存在。例如，对于归国的想法，他说出最后想要死在故乡。目前还不打算离开日本是因为目前交际范围的考量，将来到了老年阶段还是想要回国。在此部分可知，个案F具有某种对家乡的认同。

华侨华人祖籍地认同的世代差异性。现居海外的老一辈华侨华人，由于早年有过回乡的经历，或者早年就是在家乡渡过的，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乡怀有一股“根基性”的感情；而新生代的华人后裔，从出生到接受教育都是西方的，他们不会讲华语，不会认汉字，祖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想像共同体（刘朝晖，2006）。

虽然上述学者的论述很有道理，但至于华侨对家乡的认同的世代差异性，或许并不一定是如此。就像本研究的个案F，他还算是年轻一代，但对家乡具有强烈的认同。笔者认为，他的这个态度应该可视为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想法。这种侨乡认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表征之一。

（二）归化

与归国问题一样，对于归化的看法也应该可以反映出个案认同的表现。从他们对于归化的看法能找出探究认同的线索。

嗯，我以前确实想过，甚至大一的时候觉得自己归化更好，因为归化的话，像留学到其他国家什么的，各种事情都很方便，所以当时查很多相关资讯，可是制度上还是有点麻烦，所以后来就无所谓了。将来也可能不会归化吧，手续很麻烦。也没有这方面的必要。

（个案T）

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在生活上一定要有日本国籍的某种原因的话，或者不归化感到非常不方便的话，或许会选择归化，但没有这些事就继续这样就可以。

（个案F）

我原本是中华民国国籍的，后来把它改成日本国籍，至于具体几岁的时候改了，我也记不住了，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改的。

（个案Y）

我是比较有那种偷懒的部分，如果归化了我就是中国系日本人（日籍中国人）嘛，反正都要跟别人说这个背景有点麻烦之类的（笑）不过日本护照真的是世界上也属于很方便的一个，所以这是很大的魅力，因为这个部分吸引我就以前确实想过归化，可是因为中国国籍困难过的事，除了出国旅行之外都没有，所以就不用了。如果将来跟日本人结婚的话，可能会有归化的想法，可是目前的话就现在这样就好。

（个案L）

嗯，有有，尤其是最近经常想这个。就是我从今年开始参加健美比赛，像是锻炼肌肉的那种比赛，我就以比基尼项目的选手来参赛，这是我自己的爱好，在这个领域努力一下，然后我的梦想是将来取得专业选手的资格到

海外参赛，所以将来这样经常去海外的话，日本国籍应该比较强的吧，像是较容易申请到签证什么的，这方面日本国籍最强，所以为了这个部分我有改国籍的想法。比起中国国籍的话，真的容易通过申请，这是实际的很现实的事情。

（个案S）

从上述五位的描述可见，除了个案F表示，完全没有这个打算之外，大家或多或少都对归化表示此可能性的存在，并且几位对于归化的看法较有共通性。例如，个案T和S都表示考虑过或很有可能归化，仔细看其原因就可知，他们想法具有共同之处，就是其考虑归化的原因纯粹在于日本护照的便利性。个案L也表示，日本护照较方便就感到吸引力。

日本华侨对于放弃中国国籍，取得日本国籍这一事没那么感到抵抗感。对他们来说归化只是一个追求便利的手段而已，就是说国籍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护照，所以它并不否定自己的认同（刘杰，2008）。从访谈描述中也可见，的确是上述学者提到的一样，他们对归化的看法就是偏向于追求方便性的，并且对自己的认同似乎没有影响的样子。赵师哲的访谈中也可看到跟本研究较类似的状况，有个案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即便是归化了还是中国人，改国籍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就是有目的性的归化（赵师哲，2019）。

对于国家的忠诚心，日本人是浓厚，而华侨华人较薄弱。然而对于文化上的认同，日本人会容易放弃，而华侨华人不是如此（中山一三、戴国辉，1980）。还有学者指出，华侨选择居留国国籍是为了自己和后代前途着想，是对自己和子孙负责的表现，这和数典忘祖、离本背源完全是两回事，这是适当地形式发展，为自己和后代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昆章，1999）。如果在此对国籍或归化的态度看作对国家的忠诚心的话，确实他们对国籍的执著心没那么大，从他们的回应也可知，比起国籍还是自己生活的方便更重要，但这只是自己和自己后代发展方面的考量而已。只有个案F对归化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认同或意识比较强烈的样子。

四、语言使用状况

语言是认同的重要表征，从个案的语言使用状况应该可以得到探究认同议题的线索，因此这里提问平时在家里的语言使用状况。

（一）家庭语言使用

在家里的话全部都讲中文，然后也有可能是天津话，可是我不太清楚普通话和天津话的界线，所以两者的比例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家里不会出现日文，除非是那种固有名词。

（个案T）

是讲中文（普通话）跟福建话，大概7:3或8:2的感觉，讲方言的比例比较小，然后在家里不会出现日语。跟父母讲话的话，福建话的比例稍微提高一些，跟姐姐的话基本上是普通话。

（个案F）

我在台湾的时候，真的95%是中文，剩下的是台语，对。来日本之后在家里8:2的样子吧，日文8中文2，或许中文二成都没有，跟妈妈是讲中文，她也不会跟我讲台语，所以整体就大概8:2吧。

（个案Y）

整体的话大概6:4吧。6是中文，4是日文的感觉。跟爸爸是一半一半，会讲中文也会讲日文，真的是一半一半，甚至我跟他讲中文然后他用日文回这种事都有。跟妹妹的话10就是完全是日文，然后妈妈的话8:2的样子，中文的比例很多，只是line联络的时候用一点日文而已。

（个案L）

现在除了我以外，我家人都在中国，现在跟我男朋友一起住的，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全部用日文。小时候在日本跟家人住一起的时候可能大概7:3的样子，7是日文3是中文，就是说当时我不会讲中文，所以跟妹妹说话全用日文。可是回中国之后变成中文了，现在我妹不会讲日文了。

（个案S）

在日华侨不但在社会上，甚至在家庭里也都满口日语（臧广恩、蒋永敬，1959）。日本华侨华人在社会上的语言使用的确比较集中在日语，但从五位受访者对语言使用的描述就并不难看出，在家庭里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中文使用，甚至有个案T和F在家庭里全用中文，所以每个家庭的语言使用状况还是不大相同。

金帅做过在日华侨家庭的母语教育情况研究，结果显示，45%的家庭还是家里常说中文，然而家庭里不说中文的在日华侨家庭也已经超过全体的一半（金帅，2017）。从该项调查可知，日本华侨家庭中的语言使用状况已经非常不一样。有的家庭完全不说中文，也有家庭是完全用中文沟通，还有家庭是中文和日文混合使用，所以还是需要着重每个个体的实际状况。

人类在习得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相应的自我认同，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系统，包括内在的情感（如个性）和外在的情感（如文化）。这种自我认同与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王爱平，2006）。

语言行为是语言认同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要想考察说话人的语言认同，就必然要考察其对语言的运用情况。另外，在家庭环境中形成的语言使用意识，对于华人的族群认同的形成和模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华人在公共场所使用外语，是出于能更好地与其他不同母语的族裔交流的目的，或者说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那么在家中选择说什么语言和不说什么，则取决于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陈颖，2012）。

就从本研究的五位受访者家庭里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他们虽然使用比例上都因人而异，但或多或少的会使用中文。按照上述两位学者所提到的看法，中文运用状况较多的是个案T和F，他们均在家里全用中文，不会出现日语，他们两位对中文使用频率可以算是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对认同的表现如何呢？语言运用较多的个案F对他认同表示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语言运用的多少好像并不一定牵涉到他们认同或中国人意识。就像个案T的状况，他在家都用中文，可是他的认同比较倾向于日本人认同，他自己都表示已经产生日本人意识。所以陈颖所说的家庭语言使用对认同有重要影响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个案，不适用于本研究的个案T的状况。

与此相反，个案L在家庭语言使用上，并不完全使用中文，但她表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她说这么想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她会说中文这件事，因为自己会中文所以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使用中文的比例也并不一定是对认同建构直接影响的因素，毕竟在家庭里全用中文的个案T都开始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因此围绕着这些日本华侨华人认同的情况十分复杂，不难看出对认同的建构产生影响的因素不是只有语言。

当然陈颖所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华侨华人，而本研究所面向的是日本华侨华人，就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不同，产生不同也应该是很正常。但观察到这些五位受试者的语言和认同意识之间存在的状况每位都这么不一样，是很有趣的结果，并且这也表现出每位日本华侨华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背景都不同，现在日本华侨华人的多样性。五位个案在家里语言使用状况整理于表3。

表3：家庭语言使用状况

个案	语言
T	基本上都是中文（普通话）
F	普通话与福建话的比例为7：3或8：2
Y	日文与中文的比例为8：2
L	日文与中文的比例为4：6
S	日文与中文的比例为7：3

高桥李玉香从日本侨报的日本化现象解释了日本华侨社会的日本化，她指出，华侨的日本语化反映了一个事实，华侨子弟对中文理解及书写能力不及日文为高，从这点也可说明日本华侨社会的日本化程度（高桥李玉香，1999）。从本研究五位受访者的描述中也的确看得到或多或少的日本化现象。尽管如此，这只是华侨社会的日本化，而不是日本华侨的日本化。除了个案T持有日本人意识之外，其他四位受访者对自己的认同没有看到明显的日本化，甚至个案F一直有强烈的中国人认同，而且出生在日本后几乎都在日本长大的个案L都表示自己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要了解日本华侨华人认同状况，不能从单一角度去看事情，更需要从多种多样的事项来尝试认识他们认同的样态。

另外，必须得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本研究所访谈的五位个案虽然中文程度各自不同，但还是或多或少会中文，这只是偶然本研究所招募到的个案都会中文，而不是所有在日华侨华人一定会讲中文。实际上，不难想像不少的在日华侨完全不会讲中文，而且他们的语言习得与使用的状况还是对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张玉玲所访问的个案当中，有一位在日华侨人士表示，因为出生地和长大环境都在日本，就完全不会中文，甚至他的心里都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张玉玲，2005）。

（二）家庭以外的语言使用

与上一题一样，这里继续提问个案的语言使用状况，因为日本的语言使用绝大部分都以日文，所以这里提问个案在外面时的语言使用状况。

全部都是日文，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上也是95%都是日文，然后偶尔用到中文和英文。有时候会有中国客人会来，当然还会有其他国家的。

（个案T）

例如工作上还是几乎100%是日文，偶尔会用到中文，因为有时候中国客人也会来。

（个案F）

跟我妈讲中文也讲日文，其他的都讲日文，因为在外面的周围都是日本人。

（个案Y）

这是9:1，几乎都是日文，在外面打工偶尔会有中国客人才使用中文，基本上出门就用日文。

（个案L）

嗯，应该97%都是日文，剩下的有一点点中文和英文的感觉。

（个案S）

从上述的表述可知，与在家庭里的状况相反，他们在外面基本上都使用日文，而且用到中文的机率极少。

陈颖所调查的华人在生活区域中的语言使用不但受华人的族群认同意识的影响，而且是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是他们获得族群归属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寻找“文化”的根的一种行为（陈颖，2012）。

但实际上，本研究的五位受访者在生活区域中几乎没有中文使用机会，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个案F和L具有中国人认同，所以本研究当然不排除华侨华人在生活区域中的语言使用受族群认同意识影响的可能性，但至少本研究的五位受访者均没有在外面使用中文的机会，所以外面的语言使用，如果影响他们的认同的话，应该

是假设因为日文不好，一听就被发现是中国人的情况下才会有影响，因为这样的情况才会再次让他意识到自己身分的机会。

语言不仅是族群认同的属性，语言本身也是人类群体的一种非理性的和下意识的身分认知，因此语言认同相对于族群认同来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黄行，2016）。所以个案F和L在家里的中文使用很有可能对他的中国人认同的建构起到了作用。五位个案在外面的语言使用状况归纳在表4。

表4：家庭以外的语言使用

个案	语言
T	基本上都是日文
F	基本上都是日文
Y	除了跟母亲说话，都是日文
L	日文与中文的比例为9：1
S	超过90%都是日文

结语

本研究皆在探讨日本华侨华人青年认同的建构过程与其成长背景多样性。本研究主要采取质化研究法，访谈日本华侨华人青年，从我是哪里人？、语言使用、归国以及归化等几个角度进行访谈，试图分析并将他们的认同类型以及语言使用状况进行归类。结果发现，本研究受访者的具有复杂的背景，认同类型、语言使用状况都是多种多样，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每位受访者对于认同的表现及其认同强度和类型都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认同完全是中国人，但也有几位表示自己哪一边都不是，具有跨国界的认同，更有一位表示已经产生自己是一名日本人的意识。

（二）日本华侨华人青年对自己身分负面认同随着成长减少。虽然他们的认同类型都因人而异，但本研究在访谈与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受访者对于自己身分负面认同随着成长而减少的现象，即他们表示小时候不想被周围人发现自己是华侨或有华侨背景，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负面认同有所减少，且进一步发展为正面的认同。

（三）认同与归化不冲突。受访者们表示，假如自己选择归化也只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归化，就是说他们对归化的看法就是追求方便性的，并且还表示，对自己的认同似乎没有影响的样子。

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华侨华人在多种文化与语言环境当中长大，背景相当复杂，其认同以及语言使用状况都因人而异。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程度都跟过去的华侨华人又有很大不同。

包括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本身的想法与观念方面，过去十几年或二十年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让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不感兴趣的年轻世代确立中国人意

识。笔者认为，当时的确是让他们如何拥有中国人认同是重大问题，但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不难想像现在日本华侨华人的生活以及想法也有所改变。

因此，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本身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需要对华侨华人有全新的认识，不能以过去的眼光以偏概全地看待他们。并且，日本华侨华人在日中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生活下来，他们的文化习俗、语言状况、衣食住等各个方面都有两种文化和语言混合的一面，甚至思维方式都如此，因此很难抓住到日本华侨华人一定是如何之类的事，这也是本研究采取质化研究的原因。总体而言，从本研究个案的状况可见，日本华侨华人也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越来越多样的情况。就是说本研究的五位受访者表现出的认同样态或许也说明华侨华人本身的多样化，今后继续关注该议题，一定会认识我们所不知道的华侨华人的样貌，也需要以多种多样质化研究的方式去探究。

另外，对于移民或其子女认同的看法方面，同样需要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就是可以以更加正面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移民认同的状况，毕竟已经看到了受访者对自己负面认同的减少甚至是消失，而且具有双重或跨国界认同的受访者也表示自己处于的背景和环境挺好，他们这样正面看待自己的认同，那么，我们也应该需要以全新的视野和态度来看待华侨华人。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本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与局限。首先，在调查个案方面，本研究以日本华侨华人青年做为调查对象，虽然本研究采取质化访谈，虽然程度都不一样，这五位个案都会中文，但实际上，日本华侨华人当中也有不少人是不会中文的，可惜本研究没机会访问不会中文的华侨华人，这也是笔者感到局限的部分。因此，未来在日本华侨华人认同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的话，希望可以从不会讲中文的华侨华人个案也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中文：

陈颖，2012，《美国华人社区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以华府和纽约洁户会区为例》，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国贵，2012，《漂流：华人移民的身份混成与文化整合》，香港：中华书局。

高桥李玉香，1999，〈横滨华侨社会的探讨-日渐同化的步伐〉，原武道、陈湛颐、王向华主编，《日本与亚洲华人社会》，香港：商务印书馆。

过放，1999，《在日华侨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华侨の多元的共生》，东京：东信堂。

郭玉聪，2001，〈神戸华侨华人二三代的中华文化认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页33-40。

郭玉聪，2005，〈日本华侨华人二、三代的民族认同管窥—以神户的台湾籍华侨、华人为例〉，《世界民族》，第2期，页39-43。

黄昆章，1999，《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世界华人研究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黄行，2016，〈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页25-32。

江宜桦，1998，《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

林南，2011，〈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东西方身份对比？〉，何成洲主编，《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批评与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淑馨，2010，《质性研究：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

- 刘朝晖, 2006, 〈侨乡认同的建构与侨资走向剖析—以一个流产的侨资项目为例〉,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 《跨国网络与华商侨乡》,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 王爱平, 2006, 〈汉语言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400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 页86-90。
- 王沛、胡发稳, 2011, 〈民族文化认同: 内涵与结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 第1期, 页101-107。
- 臧广恩、蒋永敬, 1959, 《日本华侨教育》, 台北: 海外出版社。
- 张海钟、姜永志, 2010, 〈方言与老乡认同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期, 页25-28。
- 朱慧玲, 1999, 〈日本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当地化之态势〉, 《八桂侨史》, 第1期, 页14-19。
- 庄国土, 2001,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庄国土, 2005, 〈论东南亚华族及其族群认同的演变〉, 张启维主编, 《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 台北: 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 中文考试服务网, 〈关于HSK〉, <https://www.chinesetest.cn/HSK>, 上载日期: 2024年3/9日。

日文:

- 滨下武志, 2013, 《华侨・华人と中华网—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构造と展开》, 东京: 岩波书店。
- 陈天玺, 2003, 〈华侨华人を見つめる目〉, 《中国21》, 第17号, 页139-156。
- 金帅, 2017, 〈东京における华侨华人子女の母语教育—1978年代以降の家庭教育を中心に—〉, 《大学院研究年報総合政策研究科編》, 第20号, 页65-68。
- 刘杰, 2008, 〈华侨社会の戦后史〉, 谭璐美、刘杰, 《新华侨・老华侨—変容する日本の中国人社会》, 东京: 文艺春秋。
-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81, 《华侨—商才民族の素顔と実力—》, 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社。
- 石川朝子, 2006, 〈日本华侨・华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に関する一考察: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と他者との関係に焦点をあてて〉, 《大阪大学教育学年报》, 第11号, 页141-153。
- 石川朝子, 2008, 〈中国に留学する日本华侨・华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华侨であることの特殊性—〉, 《大阪大学教育学年报》, 第13号, 页81-94。
- 藤田结子, 2012, 〈「新二世」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メディアの役割—米国・英国在住の若者の調査から〉, 《アジア太平洋研究》, 第37号, 页17-30。
- 永井智香子, 2015, 〈新华侨二世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探る〉, 《多文化関係学》, 第12卷, 页3-20。
- 赵师哲, 2019, 〈新华侨二世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华料理人子弟の进路選択の視点から〉, 《爱知淑徳大学论集—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編》, 第3号, 页67-80。
- 张玉玲, 2005, 〈ミクロな視点から見る在日华侨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过程: 二世, 三世および「リターン者」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通して—〉,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 第1号, 页57-91。
- 中山一三、戴国輝, 1980, 〈アジアの华人・华侨问题〉, 戴国輝主编, 《华侨「落叶归根」から「落地生根」への苦悶と矛盾》, 东京: 研文出版。